

影像为语长乐翁

海上谈艺录

湯曉丹

夏瑜 蓝为洁 著
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编

上海文艺出版集团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海上谈艺录丛书

影像为语长乐翁

夏瑜 蓝为洁 著

上海文艺出版集团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影像为语长乐翁/夏瑜,蓝为洁著. —上海:上海锦绣

文章出版社,2012.2

(海上谈艺录)

ISBN 978-7-5452-0817-7

I. ①影… II. ①夏… ②蓝… III. ①汤晓丹(1910~2012)—评传 IV. ①K8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10491号

“海上谈艺录”丛书获  资助

策 划 杨益萍 张晓敏

统 筹 沈文忠 倪里勋 徐明松

责任编辑 吴 迪 胡 捷

特约编辑 孙建成 司徒伟智

封面设计 姜 明

技术编辑 李 荀 孙宗霄

丛 书 名 海上谈艺录

书 名 影像为语长乐翁·汤晓丹

著 者 夏 瑜 蓝为洁

出版发行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长乐路672弄33号(邮编20004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一众印务中心

规 格 787×1092 1/16

印 张 11.75

版 次 2012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2-0817-7/J.494

定 价 3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装单位联系 021-56477080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老年汤晓丹



汤晓丹一家难得团聚，
左起：次子沐海、汤晓
丹、夫人蓝为洁、长子
沐黎



汤晓丹与儿子沐黎（右）、沐海（左）



汤晓丹回故乡为云山小学题写校名



汤晓丹和《不夜城》编剧柯灵（右）、主演孙道临（左）合影



2004年汤晓丹荣获第24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终身成就奖



汤晓丹（左）在为影片《廖仲恺》中扮演廖仲恺和孙中山的演员说戏

“海上谈艺录”丛书编辑委员会

编委会主任 杨振武

编委会副主任 陈 东 吴贻弓 杨益萍

编委会委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汝刚 江明惇 陈 东 迟志刚 张元民

张建亚 张晓敏 陆在易 吴贻弓 杨振武

杨益萍 何 麟 尚长荣 周慧珺 施大畏

胡国强 凌桂明 程海宝 穆端正 戴炜栋

策 划 杨益萍 张晓敏
统 筹 沈文忠 倪里勋 徐明松



目 录

艺术访谈

自学成才 终成大师	003
-----------------	-----

艺术传评

第一章	走出故乡	019
第二章	上海传奇	031
第三章	来去香港	046
第四章	后方轶事	059
第五章	天亮前后	072
第六章	南征北战	091
第七章	山雨欲来	106
第八章	人间炼狱	119
第九章	自由之后	133
第十章	红色大片	153
尾 声		165

附 录

从影大事记	171
感恩（代后记）	179

艺术访谈



我可以说是“自学成才”的。

1929年，我只身到上海，参加左翼美联后认识了许幸之、司徒慧敏，认识了剧联的沈西苓、大道剧社的导演苏怡等等，比较广泛地参与他们的各种进步文化活动。有时我们会购买一张票，到电影院反复看同一部电影，自学电影艺术手法。当时除了我国的新电影，还有很多外国电影，也值得我们学习。后来他们都进入电影公司拍片，我也就有了机会在22岁时走上电影道路。

至于解放后我能够拍出那么多难度大的电影，都靠政府和部队的支持，靠摄制组每个成员的呕心沥血。2004年我获得终身成就奖，2005年获得“国家有突出贡献电影艺术家”称号，2011年末又荣获首届“中华艺文奖”终身成就奖。我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实际上属于关爱中国电影发展的每一个人。很多人已逝去，没能参与这些奖，我幸运地代表大家领奖，也为大家感谢评委！

——汤晓丹



汤晓丹与夫人蓝为洁（牛群摄）

自学成才 终成大师

时间：2010年2月14日—17日

地点：华东医院病房

采访人：蓝为洁（汤晓丹夫人）

被采访人：汤晓丹

难得每个时期都有电影作品

2010年2月14日 农历正月初一 上午

蓝为洁（以下简称蓝）：昨天很晚了，崔永元《电影传奇》节目的编导赵一工还打电话给我，第一要我传达他给你拜年的诚意；第二，他说你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的特殊贡献是每个时期都有作品，譬如：

1932年从导演《白金龙》开始，《飞絮》、《飘零》都被评为新锐作品；

1934年到香港摄制粤语故事片长达8年之久，与英、美争夺粤语观众你是第一人；

1943年到抗战大后方重庆导演了一部抗战电影《警魂歌》；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你回到上海导演了《天堂春梦》等几部抨击时弊的社会电影；

1950年新上影成立后导演了《胜利重逢》、《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红日》等一批军事题材影片，媒体赞扬你是“不穿军装的将军”、“银幕将军”。

汤晓丹（以下简称汤）：十年动乱前，我作为上影导演拍的10部影片中7部是军事题材。赵一工虽然年轻，他倒认认真真做了研究。

蓝：赵一工认为最难得的是你在“文革”时参加了新拍的《渡江侦察记》、《难忘的战斗》、《祖国啊，母亲》三部“文革电影”。粉碎“四人帮”后的“拨乱反正新时期”，你又导演了《奥蕾·一兰》、《南昌起义》、《廖仲恺》，还得了金鸡奖“最佳导演奖”。

汤：赵一工理出的一条摄制路线，实际上就是我一生走的影道奇险路。

蓝：赵一工对“文革电影”兴趣很浓，今天我们就谈谈“文革电影”吧？

汤：“文革电影”是诞生于特殊年代的作品，动乱前没有，以后也不会再有了，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上影最早的“文革电影”是1971年的现代京剧《海港》、1972年的现代舞剧《白毛女》、1975年的故事片《战船台》和《春苗》。当时我看见几位导演都重新走进了摄制组，说实话，心里痒痒的，很羡慕他们能得到信任。等到我也进了新《渡江侦察记》摄制组后，才发现日子并不好过，整天提心吊胆，说不定哪一天就会被再揪出来当“黑线回潮”的活靶子。上面指令将新老《渡江侦察记》两部电影对照放映，检查塑造英雄人物是否遵循“三突出原则”时，简直是在批判我，我更心惊肉跳。当然我也非常担心把吴老贵的戏让给李连长，敌情报处长的戏也让给李连长，那样的话无疑会让观众感觉李连长是在演“独角戏”，没有矛盾冲突，也就没有可看性。但是只能悄悄在心里难受、担忧，不能有丝毫的情绪流露。指定要我发言时，我也老调重弹：自己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塑造英雄群像是与“三突出”唱对台戏……其实我当年在导演《渡江侦察记》时，江青还没有发明“三突出原则”，硬拉来对比检查，荒唐可笑。不过，逼人说假话的场合，不违心是傻瓜，真违心也是傻瓜，我只能真真假假，接受不点名的批判，这比起拳打脚踢毕竟大有进步。

蓝：你觉得你的“文革电影”中最难弄的是哪部？

汤：当然是玛拉沁夫编剧的《祖国啊，母亲》。不是我与编剧合作有问题，而是编剧与市委派到摄制组指手划脚的两位青年有矛盾。他们自恃有权，指出戏要这样写，人物关系要那样发展，惹得编剧发火，指责他们根本不懂民族政策。和我联合导演的张惠钧见我不参加争论，当然也不说话，玛拉沁夫几次要带着本子回内蒙，我都劝他留下。其实，我心里明白，玛拉沁夫的创作观点是对的，他很了解民族政策。影片拍出来，真有不符合民族政策的问题，受批评的仍然是编导，而不是那两个愣头青。他们在组里确实碍手碍脚，幸好“四人帮”很快垮台，他们也不知溜到哪里去了，我们的戏才顺利拍成，在全国发行，向内蒙古自治区成立30周年献了礼。因为粉碎了“四人帮”，无中生有的责难与麻烦少多了。相比之下，《祖国啊，母亲》的命运比《难忘的战斗》好了不知多少倍。其实《难忘的战斗》当初的审片评语也相当好，放映后反响非常强烈，大家都说是部好影片。

蓝：好了没有多少时间，突然销声匿迹，我们到处打听，众说纷纭，谁也不知道又出了什么大事。

汤：幸好老局长丁振铎小声透露，“是结尾秤砣的细节犯了忌”。

蓝：这是早编好的戏，招惹谁了？

汤：据说有位领导，小时候胖乎乎很可爱，大家给他取个外号叫“秤砣”，其实是爱称。熟悉情况的人就上纲上线，并没有人提出要禁映影片，但是一传十、十传百，谁也不敢再排片放映了，就这样把拷贝压在仓库里发霉。后来我在北京多次提出想看看《难忘的战斗》，想要翻个带子，没有人答腔，我就明白了丁振铎透露的“犯忌”危害多大。我也就学乖不再对人提起它了。说穿了，还是“文革”的流毒，“造谣千次变成真理”。结果颠倒是非，谁也没有责任。谁也不想去查出事件或流言的真实起因和来源，这就是悲剧。

蓝：你参加的第一部“文革电影”新《渡江侦察记》，几乎所有传出的大道和小道消息都说是江青点名要拍的，什么“出绿”、“三突出原则”、“拍一场审一场”……越传越神，越传越离谱。只有我有疑问，知道徐景贤已经退休回家后，就请他的堂弟徐景新带我去他家，他送了我一本香港出的《十年一梦》。我趁机问他：“江青怎么会想到要重拍《渡江侦察记》？”他才如实告诉我，江青在北京说过“如果实在找不到好题材或好剧本，过去拍过的《南征北战》可以重拍”。张春桥回上海后说，既然北京可以重拍《南征北战》，我们上海也可以找过去好的片子重拍。找来找去只有《渡江侦察记》。决定重拍后，江青并没有关心过这个戏。

汤：我进摄制组后，只听说江青一直在抓影片质量，几乎每天都有她的指令，让人手忙脚乱。

蓝：当时有人假传“圣旨”，谁也不敢有疑问。徐景贤说江青最后看过新拍的《渡江侦察记》，只提了一个意见：“赵抒音的老奶奶面孔化妆还可以，手就显得太胖太年轻。”徐景贤只好叫摄制组把赵抒音的镜头尽量剪短了用。现在看来，关于“文革电影”有诸多不实之词，也没有认真总结过。

汤：幸好没有总结，要总结人人都会吐苦水，除了我担心再被打倒永世不得翻身外，我看别的人日子也不好过，那是一个扭曲人心、扭曲社会的畸形环境，根本不可能正常创作。

冒险香港行

2010 年2月15日 农历正月初二 上午

蓝：中央电视台《电影传奇》节目对于你在香港当导演那段经历也特别感兴趣，因为你是从上海去香港的第一位电影导演，专拍粤语片，成绩又那么大。

汤：去香港真的有点冒险，应该说是被逼上梁山的，已经去了不留下来干怎么办？当时根本没有退路。回上海重进摄影棚是不可能的。

蓝：把你找去的邵仁枚是邵醉翁的亲弟弟，他与你并不熟悉，怎么会诚意动员你跟他远走香港呢？

汤：他买了《白金龙》在南洋的发行权，赚足了钱才找我去合作的。我想，邵仁枚与我谈话前，他们兄弟有过交流，否则，邵仁枚不敢把自己赚的钱投注在香港冒险拍电影。他投资的目的还是相信会一本万利。因为我拍戏成本最低，几部影片都属盈利，《白金龙》更是赚了大钱。邵仁枚是邵氏四兄弟中的老二，比我大10岁，背景厚，敢冒险，对我也估计过高，误以为只要我导演就稳赚钱。他精于营销，却不懂生产。《并蒂莲》虽然剧本有点俗套，但还有点反封建意识，香港当时是英国势力统治，恨不得居民都反封建，不反帝。

蓝：可是《并蒂莲》放了哑炮……

汤：是呀，我都吓懵了。不久，邵醉翁到了香港，看了我们完成的《并蒂莲》，画面模糊，声音不清……他没有指责导演，只简单责问了邵仁枚：“破仓库怎么能当摄影棚拍戏呢？”邵仁枚低头不语，内疚、自责、服输。

蓝：你也吸取了教训吧！

汤：也是一生难得的机遇，邵仁枚付学费，我获益。通过这次放哑炮，我真正明白了，电影导演除了要勤学苦练，夯实艺术修养，还要懂得技术的发挥和使用。人走路靠两只脚不停地交叉迈步向前，拍电影也不例外，导演要把艺术和技术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钻研，相辅相成发挥作用，偏轻偏重不行，缺一更不行。

蓝：当时你发急了吗？是不是感到失业的威胁？

汤：沾《白金龙》导演高票房收入的光，上海艺华影业公司驻香港办事处代表毛裕茹主动找我导演《糊涂外父》。我读了剧本，很喜欢它通过喜剧讽刺不良社会风气的內容，立即答应下来。我的酬金，是毛玉茹说了算，我只提“必须在香港大观公司露天摄影棚搭景拍戏，不能有半个镜头凑合拍”。这就是《并蒂莲》给我的最实际的教益，永生不忘。

蓝：香港对你而言还有别的收获？

汤：我6岁跟母亲到西瓜哇后，进了当地的教会小学，读过几年英语，到香港后正好派上大用处。有了基础知识，自学就容易得多，香港的日常生活尤其社交活动都习惯用英语交流，我听、说、读、写都会。还要懂粤语，有些生活用语非常精彩，有内涵，喜剧语言就更重要。我导演《廖仲恺》时，夏衍还特别提醒我要研究广东人的语言和生活习俗，说明他对我在香港的电影业绩并不了解。我把在香港拍粤语故事片时的生活积累用在刻画廖仲恺、何香凝夫妇身上，恰到好处。

蓝：香港舆论称你是“金牌导演”，怎么我在重庆见到你时那么贫穷，导演中只有你是在食堂吃霉米饭，你的“金”到哪里去了？

汤：这就是舆论，如果我真的腰缠万贯，大家可能还会说我是“吝啬鬼”呢！正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一直追求作品要有益于促进社会发展，从未对酬金的多少讨价还价，所以我拍戏的机会多。其实与多得者比较起来，我并不吃亏。诸多电影人，钱来得多，去得也多。我收入比别人低，量入为出，少许多不必要的应酬，节约好多时间自学。抗日战争时期，我能在电影厂的职工食堂与大家共吃发霉的米饭过日子，是人生难得的体验和积累。正因为有那些难吃的一日三餐，所以在拍《红日》外景期间碰到特大灾害吃杂粮时我并不认为有多苦。人的一生，要有对比，才会“知足常乐，明知不足也照乐”。

蓝：你与人相处格外宽容，所以口碑好。

汤：像感激邵仁枚为我付《并蒂莲》学费一样，我同样感激艺华公司少老板严幼祥，在《糊涂外父》开拍前就从上海带了十几个有拍摄经验的人到香港工作，我才能一呼百应，将影片完成得又快又好，很卖座。当时有人劝我问严幼祥追加酬金，说我不要钱是“傻”，我说我不傻，是忠厚，讲诚信。

蓝：能不公平的环境中挣扎求成，你是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了。

汤：所谓公平不公平，有时是私欲作怪。想穿了，人最大的公平就是生不带